

台湾研究丛书·文学

台湾新文学概观

黄重添
庄明萱 编著
阙丰龄

鹭江出版社

台湾研究丛书·文学



上 册

台湾新文学概观

黄重添
庄明萱 编著
顧主於



鹭江出版社

台湾新文学概观（上册）

黄重添 庄明董 阙丰龄

*

鹭江出版社出版

（厦门鼓浪屿安海路35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8.75印张 2插页 207千字

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书号：10422·34 定价：1.60元

编者的话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进一步了解台湾，正确地认识台湾，是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

厦门和台湾只有一水之隔，开展和推动台湾问题的研究，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为此，厦门鹭江出版社和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决定共同编辑这一套《台湾研究丛书》，希望能够为促进海峡两岸的相互了解和学术交流，作出一些微薄的贡献。

这套丛书将系统地反映学术界对台湾研究的最新成果。它将本着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向读者介绍台湾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历史、文学等方面的情况，提出作者个人的研究心得和学术见解。本丛书除了发表大陆学者研究台湾的论著外，还将翻译介绍台湾和海外同行有代表性的专著。

我们提倡不同学术观点的互相交流和自由争论，欢迎对本丛书提出批评和建议。

前　　言

台湾新文学是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开展对台湾新文学的研究，无疑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这对进一步促进海峡两岸文化艺术交流，拓宽我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为此，我们谨献出微薄的心力，在几年资料准备与教学实践的基础上，撰写了这本《台湾新文学概观》。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祖国大陆对台湾文学的研究暂付阙如，至今出版的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史，没有一部涉及台湾文学，这当然是不正常的。自一九七九年开始，随着祖国统一大业形势的发展，对台湾文学的介绍与研究，已日益引起各方面的重视。广大教学、研究工作者和期刊、出版部门的同志，以历史的责任感，致力于这个新的文学领域的开拓，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可喜成果。当然，祖国大陆对台湾文学的研究，目前还处于开创阶段。随着资料的充实，研究的深入，相信会出现新的突破与发展。

发轫于二十年代的台湾新文学，半个多世纪以来，几经时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递变，它所孕育的特殊体质，繁复而多样的形式，以及肩负的使命，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呈现出纷纭驳杂的情势。一方面，它继承了中华民族的文学传统，蕴含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又有许多独异因素：既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又受到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在某一时

期或具体作家的作品中，又往往良莠并存。其中，有健康的现实主义文学，也有迎合小市民低级趣味的庸俗作品，还有一些具有“反共”意识的创作。这就决定了对台湾文学的研究，既要和祖国文学相连结，又要根据台湾特定的社会历史与现实环境，从作品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加以批评。只有这样，才能恰如其分地确定各个文学流派、作家及其作品在文学发展历史座标上的位置。

《台湾新文学概观》分为上下两册。上册包括总论和小说；下册分为通俗文学、科幻作品、诗歌、散文、戏剧、文学评论等几个部分，并附有台湾文学研究论文目录索引。当然，台湾新文学林林总总，一部书稿中很难写尽它的全部。我们的写法是：有所取，也有所舍；既有面上的一般性评述，其中包括没有列出专节又有一定影响的作家，又有点上的具体分析，着重于介绍各时期有成就、有影响的代表作家。我们试图通过总体的概述和对具体作家的评论，透视出六十多年来台湾新文学的发展状况。

上述是我们撰写这部书稿的出发点和愿望。实际上，由于我们对台湾文学的研究时间不长，掌握的资料还不丰富，加之水平有限，还难以达到这个要求。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逐渐显露出其中的缺漏与不足。我们欢迎海内外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厦门大学中文系和鹭江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借此深表谢意。

作 者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于厦门大学

目 录

上 册

编者的话

前 言 (1)

第一章 台湾新文学的性质、特点和分期 (1)

第二章 日据时代小说 (16)

第一节 乡土小说的兴起、发展与重挫 (16)

第二节 台湾新文学的“奶母”赖和 (28)

第三节 “压不扁的玫瑰花”杨逵 (38)

第四节 “铁和血和泪铸成”的吴浊流 (49)

第三章 五十年代小说创作 (63)

第一节 “战斗文学”的泛滥 (63)

第二节 关心女性姻缘路的女作家林海音 (67)

第三节 “倒在血泊里的笔耕者”钟理和 (77)

第四节 承上启下的作家钟肇政 (89)

第四章 现代派小说 (102)

第一节 现代文学的流行 (102)

第二节	唱“浪子”悲歌的聂华苓	(120)
第三节	“无根一代的代言人”於梨华	(135)
第四节	背负五千年文化乡愁的白先勇	(151)
第五节	对家国“多愁善感”的陈若曦	(171)
第五章 当代乡土小说		(185)
第一节	乡土文学的崛起	(185)
第二节	“乡土文学的一面旗帜”陈映真	(195)
第三节	擅写“弱小一群”的王祯和	(211)
第四节	“标准乡土作家”黄春明	(220)
第五节	“小说界的异军”杨青矗	(229)
第六节	刻意发掘社会道德力量的王拓	(239)
第六章 新生代小说		(247)
第一节	新生代作家群的涌现	(247)
第二节	“小说界的一颗新星”宋泽莱	(257)
第三节	负有使命感的女作家曾心仪	(266)

第一章 台湾新文学的性质、特点和分期

台湾新文学发端于五四运动时期，是中国新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任何时期文学的产生都与一定的历史、政治、文化等因素有关。要确定台湾新文学的性质，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考察。

从历史背景看。台湾位于祖国东南之隅，与福建省一衣带水。据历史学家考证，台湾与大陆本是连体，后来由于海浸，才与大陆分隔开来。即便如此，它的基础仍固定在大陆架上。^①由此，自古以来，尤其到了明代初年，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台湾海峡两岸人民的交往日益频繁，其中包括彼此迁移居住。史书曾记载，从三国东吴开始，大陆人民就渐次移居台湾，主要是福建漳州、泉州二地和广东兴梅地区的百姓。这种移民运动，到了明代崇祯年间，规模更大。魏源《圣武记·康熙戡定台湾记》曰：“会闽大旱，郑芝龙言于巡抚熊文灿以船徒饥民数万至台湾，人给三金一牛，使垦荒岛，渐成邑聚……鸿荒甫辟，土膏坟盈，一岁三熟，厥田惟上土，赴之如归市”。民族英雄郑成功收复台湾后，他的部属三万人即留在岛上屯垦。继之，又有大批闽南人络绎而至。据一九二六年统计：在台湾的汉族人民，祖籍福建省的占了83.1%，其中：泉州府属各县占44.8%，漳州府属各县占35.1%。又据一九四三年统计，在六百二十万的台胞中，祖籍福建的仍占81%以

^①见1983年7月24日《人民日报》有关“史前遗址证实台湾与大陆相连接”的报道。

上。这些先后移居台湾的大陆人民，不仅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工具、生产方式，而且也带去了文化艺术、宗教信仰和风俗人情。台湾的房屋建筑、谷物种植、念祖谢神以及戏曲娱乐，大多和闽南一带相同或相似。总之，台湾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人民和大陆人民同是炎黄的子孙，台湾的文化是祖国大陆文化的延伸，台湾人民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祖国大陆一脉相承。

台湾和祖国大陆密切不可分的事实，早已为广大的台湾同胞所认同。台湾同胞提起自己的祖辈，总是忘不了说，“我们是唐山来的”，“我们的祖先在大陆”，“大海那边是咱故乡”。念祖寻根一向是台湾同胞代代相传的“传家宝”。台湾有个记者叫彭桂芳，写了题为《〈唐山过台湾〉的故事》的系列报道^①，从台湾同胞的姓氏、宗族乃至古老传统等方面详细考证了台湾与祖国大陆的骨肉关系。该书前言写道：“‘我们的祖先是唐山来的！’这句话，长时以来在台湾民间父告子，子传孙，一代叮咛一代，一直到今天，从来没有一个人会忘记：自己的‘根’是深埋在台湾海峡的彼岸，那一片五千年来绵延不断孕育着炎黄子孙的芬芳泥土中。”又说：在台湾，“‘唐山’也有人写作‘长山’……泛指地势多山的福建和广东。”七十年代以后，台湾同胞的怀祖寻根活动日渐增多。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二年，台湾先后出版了《中华姓府》、《五百年前是一家》等著作，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姓氏源流，以具体的数字说明了台湾的几个大姓同福建差不多。台湾报刊杂志也发表了大量有关台湾与大陆的渊源关系的理论文章。其中，《国魂》一九七〇年三月号发表《台湾文化的源流》；《今日中国》一九七〇年三月号发表《台湾的开拓及其传统文化》；《中华杂志》一九七〇年七月号发表《台湾与大陆的历史渊源》等，都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台湾同胞的根在祖国大陆。一九七八年

^① 该文1978年10月16日在台湾《青年战士报》开始连载。

十月，台湾的“中央图书馆”举办了一个名为“根——台湾的过去与现在”的资料展览，展出台湾与大陆有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文物图籍二百多件。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台湾史迹研究会召开会友会，研讨台湾同胞根的问题。会友们认为：台湾许多地名与大陆的地名相同，这是早先大陆移民用的祖籍地名，它的本身就明显表示了祖先的用意在于缅怀故乡。台湾《中国时报》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一日发表了一篇题为《乡土、血统、根》的文章，明确指出：“台湾是我们直接的根，而这根又嵌合在更大的根里，那便是中国。”等等。

因此，我们在确认台湾新文学的性质时，必须看到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祖国文化对台湾文学久已存在的历史影响。

从政治背景看。一八四〇年爆发鸦片战争以后，台湾同胞和祖国大陆人民一样，经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一九一九年，祖国大陆发生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中心的五四运动，在台湾引起强烈的反响。台湾的先驱者，主要是一些青年学生，他们接受了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开展了以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为目标的斗争。一九一九年秋天，在日本东京留学的台湾学生蔡惠如、林呈禄、蔡培火等，为响应祖国大陆的民众斗争，取“同声相应”之意，组织了“应声会”。这是台湾第一个民族运动的团体，但因会员不多，流动性又大，成立不久便逐渐消失。同年年底，东京的台籍留学生又组织了“启蒙会”，其情形与“应声会”相仿。一九二〇年一月十一日，蔡惠如等人又重整旗鼓，组织了“新民会”，确定以从事台湾社会改革运动为行动目标，并于同年七月十六日创办《台湾青年》（一九二二年四月改名《台湾》）。《台湾青年》在其创刊号“卷头辞”中宣称：“觉醒了讨厌黑暗，追慕光明；觉醒了反抗横暴，服从正义；觉

醒了摈除利己的、排他的、独尊的、野蛮的生活，企图共存的，牺牲的文化运动。”他们还利用放假的时间，组织“巡回讲演团”，返回台湾进行宣传，唤起台湾人民抗日救国的情绪。后来，台湾的文学史研究者称这段时期为台湾新文化运动。

在台湾岛内，大专学生首先受这种强烈情绪的感染。一九二一年，在“新民会”会长林献堂的支持下，以蒋渭水为领导，成立了“台湾文艺协会”，该会会员共有一千零三十二名，成为当时台湾社会改革运动的骨干力量，开展了新文化运动和抗日的民族运动。一批在祖国大陆求学的台湾青年，也相继在全国各地组织了青年团体，主要有：北京台湾青年会、上海台湾青年会、台湾自治会、台湾同志会、厦门台湾同志会、闽南台湾学生联合会、厦门中国台湾同志会、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等。他们和台湾岛上的社会改革运动遥相呼应，对台湾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台湾新文学正是在这种以新文化启蒙运动为中心的抗日民族运动的形势下萌发的，受到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深刻影响，从而成为这个斗争的一个重要环节。

从文化背景看。由于受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影响，从一九二〇年初开始，台湾掀起了以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内容的文学改革运动。《台湾青年》先后发表了有关文学的文章，如陈忻的《文学与职务》、甘文芳的《实社会与文学》、陈瑞明的《日用文鼓吹论》。文章指出，我国科举制度以来的“文学”，都是一些只有美丽“外观”而没有灵魂思想的“死文学”，并抨击那些把文学当作“风流韵事、茶前酒后的玩物”的旧文人。这是台湾新文学史上批判旧文学的最早文字。

一九二三年一月，《台湾》杂志刊发黄呈聪的《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和黄朝琴的《汉文改革论》，提倡必须改革旧文学，

推广白话文，成为台湾文学革命的先声。黄呈聪在文章中谈到他在祖国大陆旅行时期所亲眼看到的白话文流行的情况，极力鼓吹台湾的文学也亟需采用白话文。他说：“台湾文化之所以不能进步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一种普及的文体，可以使民众容易看书、看报、写信、写书。民众不晓得世界的事情、社会的黑暗面，民众变成愚昧，社会就不会进步。因此，普及白话文是很紧要的工作，是一个新的使命。”黄朝琴的文章指出，为了普及教育，提高文化水准，造福民众，汉文改革乃刻不容缓之急务。文中还提出了一些推广白话文的具体办法，如用白话文写信、发表议论等。他还以身作则，自愿担任白话文讲习会的教师。另外，《台湾》杂志还刊发了一些反映台湾现实生活的小说，如追风的《她要往何处去》、无知的《神秘的自制岛》等。

总之，台湾新文学是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而兴起的。台湾老作家廖汉臣在《新旧文学之争》一文中谈到：“中国新文学开始于文字的改革，而终于文学的改革。台湾新文学运动亦步其后尘，……由黄呈聪、黄朝琴提倡白话文于先，张我军提倡诗学的改革于后而渐次发展。……所以说，台湾新文学运动是受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影响而发生的，这点似无疑义的余地。”^①台湾老作家杨云萍在一次北部新文学、新戏剧运动座谈会上也说：“我想，台湾新文学的发生是受五四影响，大概是没有疑问的，如最致力这方面的发动人张我军是在北平受过教育回来的，……我也是受五四刺激的。”^②

根据上述的历史、政治、文化等诸种原因，关于台湾新文学的性质，可以作这样的确认：它是中国新文学的一个支流，具有爱国的反帝反封建的性质。即使一九四九年以后，它所表现的现

① 《台北文物》三卷第二、三期，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日，十二月十日出版。

② 《台北文物》三卷第三期，明集256页。

实意识，仍是以往精神的回响与延续。

由于台湾新文学是在台湾屡遭殖民者侵蚀的历史背景下和台湾的民族运动日益高涨的时代环境中崛起，必然打上历史和时代的深刻烙印，因此，它表现出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具有强烈的爱国的民族主义精神。

近三百年来，台湾数度沦为殖民地，屡遭殖民主义的侵略与欺凌。一六〇四年至一六六二年，曾先后沦为西班牙、荷兰的殖民地达六十年之久。从一八九五年清政府签定“马关条约”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又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一九四五年以后，即使是六十年代之后，台湾出现了所谓“起飞”的“繁荣时代”，它仍然没有摆脱东西方资本主义的控制。因此，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反对外国强权者的政治侵略和经济侵略，维护民族尊严，争取人民民主，一向是台湾人民奋斗的目标。这种在历史进程中凝结的爱国的民族主义精神，必然要反映到文学创作中来。正如叶石涛概括的那样：“既然整个台湾的社会转变的历史是台湾人民被压迫、被摧残的历史，那么……居住在台湾的中国人的共通经验，不外是被殖民的、受压迫的共通经验；换言之，在台湾乡土文学上所反映出来的，一定是反帝反封建的共通经验，……而绝不是站在统治者意识上所写出来的，背叛广大人民意愿的任何作品。”^①

文学的现象总是这样，特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必然演化出具有特殊风貌的文学。蓄含独特的乡土色彩，是台湾新文学表现出的另一个显著特点。

台湾位于祖国东南海隅，四面临海，风景秀丽，物产丰富。“这样瑰丽的大自然和副热带的气候，的确给居住在此地的历代种族带来深刻的影响，塑造了他们一种独到的性情，这就是勤劳、

^①叶石涛、钟肇政主编的《光复前台湾文学全集·总序》。

坦率、耿直、奋斗、忍从和富于阳刚性。”^① 台湾新文学是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土生土长”的，岛上的山川景物、风情人事必然成为主要的描写对象，这便构成了独特的文学风貌，表现出浓郁的乡土色彩。关于这个问题，叶石涛在《论台湾文学应走的方向》一文中谈得更为具体明确。他说：“台湾拥有同祖国大陆截然不同的副热带未开拓的原野，炙热的太阳、狂暴的骤雨、短而急的河流、矗立的高山、茂密的热带密林以及平埔族、山地种族等异色的肥沃大地与繁多的居住民族。这些构成了同草长莺飞的江南不同的特殊景观。此外，历代殖民者所带来的异质文化，在此地的建筑、村落、语言、音乐、宗教、风俗等各层面留下了不易磨灭的痕迹。然而，由于经历三百多年来历史性的缓慢整合，这些来源不一的多元性因素自然形成了台湾特殊的乡土色彩。这些乡土色彩基本上乃是属于中国的，可是在细微处仍保留着不同于祖国大陆的异彩。这样的乡土性格不但在台湾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显露出来，同时也铸造了民情与民众气质。从赖和到宋泽莱，许多台湾作家的作品里，这些乡土性格犹如那地上之盐，构成了作品的台湾风格。”^②

一般说来，台湾新文学是从三个方面来反映乡土色彩的。

其一，着力描写乡土人物。文学主要写人，描写哪一个生活层面的人必然直接影响到文学的风貌。台湾新文学作家大多能把笔触伸向社会的底层，描写那些为生活奔波的乡土人物。早在三十年代，黄石辉就著文强调指出：“你是要写会感动激发广大群众的文艺吗？你是要广大群众心里发生和你同样的感觉吗？不要呢？那就没有话说了。如果要的，那末……你总须以劳苦群众为对象去做文艺。”^③ 当代的新文学作家和理论家，也十分强调文

①叶石涛：《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见《乡土文学讨论集》。

②见台湾《中国论坛》一九八一年五月号。

③见台湾《伍大报》一九三〇年第九期至第十一期。

学必须为人生服务，要“全面地检视外来的经济、文化全面支配下，台湾的乡村和人的困境”^①，应着重表现“世居在台湾的中国同胞的具体社会生活，以及在生活中的欢笑和悲苦，胜利和挫折”^②。总之，台湾新文学作家旗帜鲜明地主张文学必须以描写那些被忽视、被困顿的“弱小一群”为职志，表现他们的困苦、奋斗与希冀。

在创作实线中，许多新老作家也倾向于此。他们笔下的人物，大半是散落在农村、渔村、市镇和工矿中为生存而辛勤劳作的工农大众，市井细民，而且，都带着台湾的历史烟尘和世俗色彩。以这套“人物班子”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台湾新文学，不用说，所表现出来的乡土特色应该是鲜明而又浓厚的。

其二，再现台湾的典型环境。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不同地域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也当不曾相同。对于特定地区的典型环境的描写，无疑是加强文学乡土色彩的重要手段。台湾新文学十分注意再现台湾的典型环境。早在新文学崛起之初，黄呈聪便在《应该着创设台湾特种的文化》中提出：台湾的文化，渊源于中国，渐次由闽粤移入，在继承传统文化接受外来文化中，应注意“适合台湾的环境、地势、气候、风土、人口、产业、社会制度、风俗、习惯等”，以发挥台湾文化的特性，“促进社会的文化向上”^③。如同当时的大陆一样，他所讲的“文化”，文学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一九三五年，张深切在《对台湾新文学的路线的一提案》中也强调了这个问题。他说：“再反复一些说，台湾因自有台湾特殊的气候、风土、生产、经济、政治、民情、风俗、历史等，我们要把这些事情，深切地以科学的方法研究分

①陈映真：《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见《仙人掌杂志》一九七七年第五期。

②陈映真：《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见台湾《中华杂志》一九七七年第一七一期。

③《台湾民报》三卷一号，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日出版。

析出来——察其所生、审其形成、识其所形、知其所能——正确的把握于思想，灵活的表现于文字。”^①他认为，只有这样，才有助于发展“真、实”的文学。到了近期，台湾一些作家与评论家对这个问题仍然十分重视。何欣说：“为了写某个特殊地区，他必须使这个地方非常突出、非常鲜明，因此他必须描写这里的衣物、风俗等等。”^②

正是这样，台湾新文学作家善于用饱蘸浓墨的彩笔，描摹出一幅幅清丽色扬的风俗画、风景画。只要我们在台湾新文学艺术世界里作一次漫游，台湾地区的风光景物、人情习俗，便历历在目，尽收眼底。偏僻贫困的渔村，鲜红明绿的街市，挟带着海腥味道的海风，田园牧歌式的山野夜色，布满海礁石的海滩头，连绵无边的槟榔林，在阳光映照下闪烁着铁红光泽的讨海人，集聚在榕树底下等待生意的罗汉脚，以及敬拜“土地公”、“王爷公”、“妈祖”等迎神庙会和庆赞年节的民间娱乐活动，犹如大自然的真实展现，活龙活现，景致盎然，美不胜收，显示出台湾特定的社会风貌和自然景观，漫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

其三，广用台湾方言。台湾大多数居民是从福建、广东移植去的，其中又以闽南人居多。因此，漳泉一带的方言便成为台湾人民广泛流传的日常用语。所谓“台语”，实际上就是闽南方言。它是台湾人民表达思想感情最主要的手段，是台湾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学作品的表达方式是以语言文字为传播的工具，作品中运用什么的语言，必然影响到作品的特色。台湾新文学作家在创作中广泛而又适当地运用闽南方言，这对营造地方色彩，加强人物形象的风俗味，都起着明显的作用。一九三〇年八月，黄石辉发表了《怎样不提倡乡土文学》^③的文章，主张用台

① 《台湾文艺》二卷二号，一九三五年二月一日。

② 何欣：《乡土文学怎样“乡土”》，见《乡土文学讨论集》。

③ 见《伍人报》一九三〇年第九至十一号。